

文明具有怎樣的特點，人竹共生對於環境或文明意味着什麼等等環境史角度的議題論述不多，這一方面或許可以作更深入的分析。作者的「人類生態系統」的概念非常吸引，但仍需要更多研究加以豐富。書中引用了大量材料，為進一步分析相關議題提供了很好的文獻線索，或許借助一些人類學、生態學的理論模型，可以更好地分析、理解這些材料。

張子健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梁晨等，《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蘇州大學學生社會研究，1949-2002》，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314頁。

近年來高等教育公平問題日益成為社會學和歷史學所關注的焦點，這些研究大多引入西方相關理論，結合當下調查統計和個人回憶等資料進行各種層次研究。《無聲的革命》以北京大學（1952-1999）、蘇州大學（1952-2002）兩校的學籍卡為資訊來源，採用了大資料分析的理念，以「生源多樣性」為評判標準，將民國時期高等教育和當今西方發達國家精英高等教育中生源多樣性情況作為縱橫比較的參照系，用六章篇幅，即「引論」、「空間分佈」、「父母職業」、「社會性別與民族身份」、「無聲革命的關鍵：來源中學」、「得失與未來」為切入點，參考當代教育公平研究成果，確認了二校在半個世紀內出現了三次關於「生源多樣性」的「無聲革命」：即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出身照顧」和「出身決定」，文革後恢復高考制度後轉為「有教無類」，當下大眾化教育向精英化教育模式的轉變以及由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變。這三次革命共同勾勒出在建國前高等教育中被極度邊緣化的人群是如何成為高等教育主要受益者的歷史過程（頁263-264）。儘管也通過資料分析和引用他人研究成果揭示了其中種種不足和不公，但研究者以「生源多樣性」作為標準，認為這三場「無聲的革命」還是值得肯定的。

在具體的分析中，研究者憑藉巨量學籍卡中突出的時間連續性、空間全覆蓋性、資訊豐富性和準確性的長處，試圖超然於當下學術界關於教育公平的種種負面研究成果和質疑，而呈現出中國這半個世紀以來迥異於西方社會流動性不足的「無聲革命」。誠然，這樣豐富詳實的一手資料打破了以往基於社會調查、個案分析的狹隘視野，給當下教育公平提供了有益的思考。但

對於研究者圍繞這一研究核心——「生源多樣性」的理解和關鍵資訊屬性的提取處理方面，筆者有不同看法。而對本書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和具體處理操作，也直接決定了該研究的科學性以及對未來實現教育公平的參考價值。

首先，筆者同意精英教育中的「生源多樣性」是觀察社會流動性的重要指標。但在這半個世紀內，「生源多樣性」與政治干預相交織，尚有諸多值得商榷之處。

第一，筆者認為，「多樣性」的首要前提是公民按照法律所賦予的權利，都有參與高等教育選拔的資格。這一核心理念也為研究者所認同，即「強調學生社會來源的多樣性，並不等同於認為教育資源應該在各類人群之間平均分配以實現簡單的公平性」，「我們強調的不是教育機會的平均分配，而是教育機會的平等競爭。機會平等才是公平概念的真實內涵」（頁263）。可是在第一次「革命」和「文革」時期，「多樣性」的實現是通過行政強制的辦法排除了部份「階級」的受教育權，甚至廢除高考制度而採取「工農兵推薦上大學」。自建國到「文革」結束近30年間，因受到各種政治運動牽連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的人不可勝計，其中大多只是因為所謂「家庭出身」不好。這不僅侵犯了基本的人權，甚至損害了教育選拔優秀人才的初衷。該書作者也注意到此點：「以致出現部分出身好的高中生並不努力學習，但確有把握上大學；而出身不好的學生，儘管學習很努力，但心理壓力卻很大，基本沒有升學的希望，消極情緒的影響下，一些女生甚至決定高中畢業後便要出家為尼。」（頁20）但並沒有就此對所謂的「多樣性」展開反思。在此要指出的是，在那個「革命」口號高唱入雲的時代，女生想要出家為尼其實也不是一件自己說了算的事。

第二，「多樣性」不應僅以生源父母職業的「多樣化」為評判標準。該書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對生源親屬進行分類，進而確認「新中國成立後的幾年時間內，工農子弟就能迅速地從邊緣群體轉變為主要構成，這種變化不能不說是革命性的」（頁97）。眾所周知，建國後「工農翻身作主人」，這樣的結果不言自明。而在行政強力干預的背景下，問題關鍵已不再是生源的父母職業背景，而是權力背景。研究者為了資訊方便處理而單單提取這一屬性，無疑用職業背景掩蓋了權力背景，也就直接導致了這樣的研究結果無法與當代教育學者所主張的「最大限度維持不平等假說」進行對話。該假說認為，在某一既定的教育階段上，較高階層總是教育擴張的最先受益者，只有當他們的需求完全滿足，好處才會輪到較低階層。顯而易見，在那個年代，最先受益者是權力階層，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與職業無關，

因為任何職業都有其權力階層。

其次，「生源多樣性」的展示方式在時空細節上遠遠不夠。這裡面可以分三點來說。

該書所有圖表基本都是當解析度精確到年以後就無法分區域展開討論，而分區域（分省分縣）的討論則都是長時段時間累計資料。可以說，各省長時段內「生源多樣性」的具體特徵和發展趨勢完全被淹沒了，從而大大削弱了這一研究在種種歷史細節上的說服力。此其一。

其二，缺乏各時段各地區社會背景資料的匹配分析和相關要素的時空同步性分析。例如北大在西部地區的招生愈往西城市生源所佔比例愈高，而江蘇各縣中蘇州大學城鄉生源數量差距則不甚明顯（頁85），這樣的論斷應結合各省逐年城鄉比例資料加以說明，但書中沒有給出這方面的資料。又如，作者認為「重點中學的設立和佈局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至少在江蘇這樣的教育成熟、經濟發達地區是如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護或促進社會中下層子弟向上的社會流動」（頁237）。但江蘇省重點校制度的推廣和以農民階層為代表的下層子弟所佔比例是否具有時空同步性，書中也付之闕如。

其三，該書認為「重點中學生源的多樣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精英大學生源的多樣化程度」（頁225-226）。由於資料欠缺，作者據重點中學生源的統計資料反推，北大在1952至1999年間、蘇大在1952至2002年間「大體上保持了生源在家庭背景上的多樣性」（頁227）。由於前文已說明工農背景的生源也可能擁有權力背景，而作為全文核心理念的「生源多樣性」在來源中學這一關鍵環節上還缺乏足夠數據支撐，論證鏈條顯然不夠嚴謹。

筆者認為，以上的種種不足一方面是因為工作量極其巨大而難以面面俱到，另一方面是沒有抓住「生源多樣性」評判的關鍵屬性。

誠然，研究者因無法將學籍卡資訊中的權力因素提取出來，不得已才使用職業這一指標。但稍有閱歷的人都知道，在建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每個人的單位、戶籍、政治面貌、家庭成分和社會關係是上學時必須考察的對象，也都複雜地指向權力背景。僅就研究者所提及的「家庭背景」和「單位」資訊而言，研究者承認「如果要討論新中國成立後前三十餘年學生的社會來源狀況，家庭出身還是有相當價值的」（頁48）；只因「改革開放以來，其重要性已經逐漸降低，甚至失去了意義」（頁48）就被輕易放棄，失去了進一步觀察「無聲革命」的一大視窗。而「單位在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中一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子女的教育獲得也有重要的影響」（頁48），並且這一屬性的至關重要性已經被學術研究所證實（參李漢林，《中國單位

社會：議論、思考與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但也因「一方面由於國內單位系統相對複雜，暫時沒有國家標準的分類與編碼方法；另一方面也因為研究小組和成員的學術背景和能力所限，故暫時未對單位這一重要變數進行分析」（頁48）為由放棄。事實上，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無聲革命」的學術價值。

行文至此，還是應該對研究小組的努力表示感謝。他們試圖為既有學術成果注入新風，勇氣可嘉，只是從核心概念的闡釋到資料收集分析都還存在缺失，讓這個研究出現了一些偏差。要加強「無聲的革命」這一論斷，還是必須要進一步充實資料庫和提高研究對象的時空解析度。

陳浩東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